

论语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
比较研究

常会营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
比较研究

常会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常会营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402-2344-1

I. ①论… II. ①常… III. ①儒家 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8736 号

书名: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

著者: 常会营

责任编辑: 胡芳

装帧设计: 北京飞亚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码: 100054

经销: 北京燕山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334 千字

印张: 20. 5

版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2344-1

定价: 29. 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5240430

序 一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部重要典籍，《〈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则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年轻的博士常会营同志近年的研究成果。他从《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著述背景、写作动机、作者、成书时间、学术评价、文字训释、义理阐发、经典诠释学等几个方面对二者进行详细的比较和研究，尽量揭示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学术趋向及其相互关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看法。而对“两注”章句文字训释的比较分析，既细致入微又提纲挈领，考释精详，其对义理的分析亦相当独到，所列几个问题亦颇能体现其思想内涵，反映了作者资料掌握与分析问题的功力。此种研究方式在学界尚不多见，该书的写作，具有拓展、深化《论语》学研究空间、论题的意义。该书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论语》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一，作者在二书的比较研究中，重视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的考察，重视从史料推出结论，如认为《论语集解》是在两汉的今、古文经学趋于合流时期的历史结晶，是对两汉师法家法的一种批判性继承；《论语集注》则是朱子自觉承继自唐中晚期韩愈、李翱开始以至伊洛二程弘扬道统，发明心性思想之结晶。如认为《论语集解》诠经的最大特点是“主训诂而兼求道”，《论语集注》诠经的特点是“借训诂以求理”；认为《论语集解》对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如“天命”的理解是受到了汉代文质三统说影响，《论语集注》则主要受到了理学家天道观、天理论的影响等等。这些观点，有根据、较平实，对于理解《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解经特点有

很多启发意义。

其二，作者最后辟专章讨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问题，试图透过二书的分析，由具体钩沉一般，探寻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一般规律。作者考察了古典解释学的源流，分析了经典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矛盾关系，探寻了经典与解经者之间通常存在的紧张关系，总结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方法、体例。虽个别结论仍有商讨的空间，但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总之，该书资料翔实，疏解细密，引证宏富，考证有力，结构严谨，论题深入，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是一项颇具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者不畏辛劳和善于思索的治学精神很值得学习，我更期待这位年轻学者在儒学研究领域再添奇葩，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懈耕耘……

吴志友

2010年元月29日

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序 二

这本书稿是常会营的博士论文修订补充后的学术成果。关于写学位论文，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学士论文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将一个学术问题解说清楚，较少错字病句，也就可以及格了。硕士论文要求就要高一点，字数在三五万之间，将一个中等的学术专题叙述清楚，并有自己的见解，对各家的成果有所评论，最好有自己的创新观点；在资料方面要翔实，引文要规范，论点明确，推理严密，条理分明，这就可以通过答辩。博士论文自然要更高一些，高在哪儿呢？首先要广泛阅读资料，从中研究出题目，题目要有意义，要有发展的空间；其次围绕题目收集有关资料；第三，研究这些资料，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最后将这些见解作深入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作充分论证，字数约在七八万以上。

常会营选择的题目是：《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历代都有《论语》的注，浏览以后，才能选择最重要的文本来研究。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是《论语》学史上的两个高峰，是古今研究者最为重视的两个文本，对二者分别研究的成果已经不少，尚未见二者比较研究的成果。作者选择这两本作比较研究，知难而进，对注疏动机、写作背景、成书时间、文字训释与义理阐发诸方面都进行了对比，对汉学、宋学之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古代诠释学的衍变及特征也作了论述；涉及面相当广阔，所谈论的问题有相当高的深度。论文选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有相当多的创见。首先考察了《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问题。何晏的《论语集解》是在两汉的今、古文经学趋于合流时期的历史结晶，它也是对两汉师法家法的一种批判性继承。它与魏代

君主尊孔读经有很大关系，“浮华”案的刺激与影响也是其著述动因之一。朱熹的《论语集注》既是对庆历以来宋儒注重义理阐发之风的继承，亦是对宋儒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之风的一种自觉拨正。从思想史的层面来说，这是朱子自觉承继自唐朝中晚期韩愈、李翱开始以至伊洛二程弘扬道统、发明心性思想之结晶，而辟佛老、振儒学这一宗旨又贯穿其始终。通过对这两个历史上经典《论语》注本的比较，考察汉学与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研究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展衍变及其特征。这些新见在儒学史、经学史、古典解释学史上，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教授和副教授事情很多，不可能集中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一个专题。而博士论文往往花三年或六年（包括硕士三年）专门研究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而且精力充沛，时间充足，撰写成的学位论文，常常成为本人的代表作，确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常会营同志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青年学者，下的功夫大，才有这一精品论文。在社会上盛行急功近利之风的时候，这样的文化精品就显得尤其珍贵。

现在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总想不费功夫，一夜成名。他们走门子，拉关系，奔走东西南北，折腾十年八年，结果一事无成，浪费了青春年华。这叫“欲速则不达”。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向青年人提倡“皓首穷经”的精神。杨庆中埋头六年研究《周易》经传，是“皓首穷经”的精神，出版两本专著，均获国家大奖；李俊祥埋头六年读《全宋文》，也是“皓首穷经”的精神，出版两本专著，也是获奖作品。常会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博士，也有六年时间，现在看到这本书稿，我发现“皓首穷经”的精神，又增加了一个新例子。作者请我作序，我就谈一点感想，便充当“序”。

周桂钊

2010年元月22日

腊八节于三枣红楼



序 三

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和现代疏解中，历来有两种路径，即文本的研究和哲理的阐发。虽然无论哲理的阐发从根本上离不开文本，但不同人对文本的理解不同和实际把握的差异造成其最终的结论与真实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相契、接近、相似、相离。从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诠释来说，更有价值的工作不应是离开原初文本的现代思辨式的重构，而应该是从文本出发，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的思想脉络的疏理和描述。也就是说，有价值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应该是在活文化的历史流动中的思想史研究。而要如此去做的时候，离开文本的思辨构想是不行的，当然离开哲理的纯文本研究也是不行的，两种研究方法必须有序地相互配合在一起。

当我们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并着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疏解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卷帙浩繁的古代元典和历朝历代对元典的注疏。对于经典进行注解实际就是历史上代代相传的哲学思想家们宣示其思想、昭告其后学的现实形式和有效途径。故有人说，中国古代哲学史实际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经学史。从对经典的注疏中了解思想家的思想，从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对同一经典的注解的比较中了解他们思想的分野，从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同一经典注疏的比较中了解思想的历史演变，这应该是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方法。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是常会营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常会营在与我商量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基于上述的理念，我们逐步明确了这样一个思路：从一本经典的研

究做起，从一本经典的不同注疏的比较研究入手，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演变角度研究儒家思想的变迁。之所以选择《论语》，选择《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则是因为《论语》是目前留存下来的研究和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最主要、最直接和最可靠的文献之一，而《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则是《论语》注解的典型。历史上，《论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人们通过考证、训诂、章句、注释等来解读和领略孔子的深邃哲理和高妙智慧。在众多《论语》注释中，《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无疑是两部最有代表性、因而也格外重要的《论语》注本。《论语集解》成书于曹魏正始年间，由玄学大师何晏等五人集汉魏期间孔安国、马融、郑玄和王肃等（八家）注解、研究《论语》之说，加以自己的理解，进行必要的整理。可以说，《论语集解》是现在可见的保存汉代《论语》研究成果最多、最集中的文献资料。正因为此，它历来为世人所重。后来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就是以此为注本的。《论语集注》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积毕生之精力，反复修改，精雕细刻而成。朱熹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在对经典文字章句的疏解过程中，汇集包括二程在内的多位理学家之说，就孔子的思想进行梳理、解释和构建。可以说，《论语集注》代表了南宋《论语》研究和疏解的最高水平。《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一为汉学之作，一为宋学之作，一有玄学的思想参与，一为理学的解读。将两者作为比较的对象，以此研究《论语》、《论语》学和孔子的思想，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会营笃学慎思，谨言敏行。历经两载，他精读《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数遍，做了详实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两书关于《论语》同章同段的不同疏解约二百条。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进一步分析、归纳，他从两书的分章断句、字义训释、章义疏解和义理等诸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在许多方面皆有新的见地。比如，他以具体的资料证明朱熹作为理学家同样重视字义章句的考释和训解，对于包括汉代学者在内的前人考证和训解的成果也是有继承和吸取的。更为可贵的是，会营既以具体的章节训解异同资料为据，又不拘泥于此，而是进而从两书训解的通书考察、从两书作者的总体思想来思索。这样，他对两书关于《论语》“知天命”、亲情伦理、君子和小人以及道、德、仁等解读的比较研究就显得更有深度。另外，他对两书的编纂过程、作者、成书时间以及两书的学术评价等的研究和考证也显示出他在传统哲学思想研究中夯实基础的努力和初步的成果。应该

说，将两书进行比较研究，视角极佳，但难度极巨。会营不畏艰辛，知难而进，终于有了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属不易，可贺可嘉。当然，这项研究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思想的比较需要加强，特别是两书的义理比较还要进一步梳理。比较研究的视野应该更宽广，应该从两汉哲学到玄学的转变、玄学在儒学思想的演变中的贡献、汉学到理学的跨越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大视域来解读两书何以对相同文本作相异疏解。有人说，一部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一位学者毕生研究工作的良好起点。会营已经迈出了如此扎实的一步，相信只要以踏实的作风、执着的毅力、科学的方法和睿智的思维去开拓，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是为序。

张奇伟

2010年4月5日

于京师园

序
三

前言

提及《论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在中国人看来，它的地位足可以与西方之《圣经》相媲美，西方无人不知《圣经》，而在中国乃至东方儒家文化圈内，亦无人不知《论语》。《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自它编纂流行之日起，受到历朝历代儒者和其他学者的关注，受到各朝各代统治者的推崇，奉为经典，长盛不衰。与此相应，从汉朝开始，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民国以至现当代，无数的学者亦为之倾注了太多心血。《论语》的注疏著作如雨后春笋，纷纷然破土而出。

在这些注疏著作之中，魏晋之际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宋著名学者朱熹的《论语集注》更成为历代论语注疏中的佼佼者。《论语集解》在它产生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三经注疏》中《论语》注采用的注本便是何晏的《论语集解》。

南宋朱熹在遍采前代及同时代诸家观点基础之上，为之呕心沥血倾其一生精力所作的《四书集注》（其中包括《论语集注》），在南宋时期便备受推崇。宋理宗赵昀就崇尚朱学，南宋宝庆三年正月十九日，宋理宗召见朱熹的儿子朱在，说：“卿先卿《四书》注解，有补于治道，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宋理宗等人的高度推崇，取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元仁宗时候恢复科举考试，下诏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命题依据，《四书集注》从而成为官方钦定教材。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被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它周边地区，其影响力达千年之久。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题目，首先便是基于《论语集解》与《论语

集注》作为《论语》注疏的两部经典著作，二者在经学发展史上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另外，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题目，还基于《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在《论语》学史上地位的重要性。由于《论语》的注解著作非常之多，不可能一一详览，所以我主要采用的便是何晏的《论语集解》和朱熹的《论语集注》。作为《论语》学史上两种最为重要的注本，两者对《论语》的文字训诂和义理阐发有着很多的相似或相近之处，对《论语》各章章义的理解也有诸多共通之处。然而，作为两位相隔近千年的不同时代的学者，由于时代背景的变换、哲学主题转移、学术范式的转换、个人思维体系的差异等等，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注解《论语》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相异之处。所以在对《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涉及到《论语》学史上文字注解和章义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及历史流变，将比较与文本的解读结合起来，从而探讨《论语》的经典诠释问题。

《论语》作为一部重要古代典籍，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曾经起过并正在起着巨大的影响。而魏晋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作为《论语》学史上两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又曾经影响过多少代的学者，对中国人乃至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天道观、性命观、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等产生过较大的历史影响。因此，对两者之间进行一番对照和比较，从两书的著述背景动机、诠释体例、思想体系、理论内容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经学史和中国经典诠释学发展变迁的探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这两部具有跨时代历史意义的《论语》学著作，后代学者特别是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对于朱熹《论语集注》的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更可谓数不胜数。而对于何晏的《论语集解》，虽然过去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近年来亦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综合对于《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学术研究，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对于《论语集解》的研究成果明显要少于《论语集注》，而对于《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成果更少于对二者自身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篇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仅仅从比较这一点上，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是任意两个事物都是可以比较的。两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可比较的平台作为基础，而且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两者的比较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两种思想之间的比较，道理应该是

一样的。正如张祥龙先生在《中西思想对话的机缘何在?》一文中所言：“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相近的两种思想才能对比，相距远的说不定更能激发‘创造性的诠释’？我的回答是：关键不在于‘远’与‘近’，而在能不能对谈起来、有效地交流起来。如果双方从基本方法和思想上毫无交融的机缘，只有一方压制、主宰、分解另一方的强悍冲动，那么这种思想上的‘拉郎配’导致的就只能是当时弱势一方的衰亡，而不是双赢共荣，更生不出有活力的后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就是这种不合适的‘中西结合’，不论在医学、语言学、历史学，还是哲学，导致的都是西方学术方法中心论的盛行和中国传统思想活力的枯萎。而历史上成功的‘中西比较’都发生在思想品行比较接近、能够进行有效的‘基因’交流的形态之间，比如印度的大乘般若学、特别是中观和禅学（而不是印度的正宗印度教和小乘佛学）与中国道家及《易》学的对话，产生了或引发了中国的天台、华严、禅宗和宋代儒学。原因很简单，两个相距已如此之远的文化之间并不缺少距离、陌生感、‘他者’感，缺少的只是亲近感、相互尊重和不被完全他者化的‘似曾相识’感。”^①我想，张祥龙先生的这番话，足可以代表现今学术界诸多学者的一种心声。同样，我认为，他的这番话也是对当前学术比较研究很好的启示。

我们可以参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博士的比较研究论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朱陆之所以能予以比较，不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同一个时代，曾有过鹅湖之会，曾在岳麓书院论学，曾互相致信辩诘，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宋代理学。尽管他们一个偏重“道问学”，一个偏重“尊德性”；一个主张“性即理”，一个主张“心即理”，但毫无疑问，他们具有相同的理学思想背景，所依据的文本大都是以《四书》为核心，所用的学术术语皆是理学术语，例如理、气、心、性、情、欲、无极、太极、道器、格物致知、虚实、义利、道统、异端等等。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两者交流、问询、辩诘的话语平台。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才能很好地对二者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思想特质。

再回归到《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来说，《论语》便是何晏和朱熹

^① 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序二，5~6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两个时代的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用自己那个时代或者本人的思想对《论语》进行注解和阐发，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理解和看法，甚至彼此之间时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当然，生活于南宋的朱子会更幸运一些，因为他能看到何晏的《论语集解》，而生活于汉末魏晋之际的何晏却是无论如何看不到朱熹的《论语集注》的。不管如何，朱熹与何晏的对话与思想碰撞在朱子的《论语集注》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仅仅凭藉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认为，朱子在作《论语集注》的时候，明显是受到了何晏《论语集解》的影响。当然，这也不排除朱子受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之影响，但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我们只选取《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这两点来予以比较，并试图通过比较两者对《论语》的相同和相异的注解与阐发，来观照和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思想异同，乃至两个时代政治文化、学术背景、话语范式、思想体系之间的诸多差异。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点对于自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对话与交流。《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其中就涉及到至少四个人——孔子、何晏、朱熹和我。而我们彼此分处先秦、汉魏之际、南宋和现代，时间间隔都有近千年之久，那么，我们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吗？我能够正确地传达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吗？这一直是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管他是主动迎合还是批判否定，无不会打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会更容易把握和接近一个人的思想特质。但是，这决不能说不同时代的人思想就不能交流，因为我们之间有共通性的东西，那就是共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失却了这个平台，那就毫无平等对话和交流可言。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子张》）

子张问孔子十世是否可以知晓，孔子告诉他，殷承袭夏礼，所损益，可以知晓；周承袭殷礼，所损益，可以知晓；那么继周之后的，即使百世也是可以知晓的。孔子所言给我们以启示：后代皆因于前代，传统可以连绵延续。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可以说，现代人可以与古代人进行交流对

话，因为我们存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也许外在的礼仪制度会有所损益，但其核心和精神却可以万古流传。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对古人的思想进行研究，不正是这种传统在延续的体现吗？余英时先生在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曾云：“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个大一统的政府。政府结构的延续性，是中国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所不同的。”^① 余英时先生总结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性，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传统的延续性，充分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本书所据《论语集解》版本为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本（标点本）《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论语集注》所据版本为南宋朱熹注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除非书中另有说明，本书所言的《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皆依托于此两种版本。

本书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是文史哲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的学术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起初并无所谓文史哲之分。只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的诸多学者借鉴和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文史哲的划分。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古代的经典文本做梳理和分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古典文本思想上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统一性。本书力争采用文史哲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尽量避免将经典割裂和支离。

二是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对于经典，我们不但对它的政治背景、思想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要有深度的把握，要对其学术思想作整体的理解，同时对于贯穿其中的基本理念、重要范畴、典型案例等，也要细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样才能做到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三是现象分析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看似分散、杂乱、无序的现象，而我们对于历史的分析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现象上面。我们要力争将它们通过分析、加工和整理，抽象出其本质的理论性的内容，从而实现现象分析与

^①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1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理论概括相结合。

四是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

训诂和义理是中国古典解释学中的两个重要方法，一个侧重训释考据，一个侧重思想阐发。前者在古文经学中比较突出，后者在今文经学及宋明理学中比较突出。笔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阐释文本思想。

五是共性与个性的互动结合。

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将研究对象置于共性与个性的双向互动框架中，藉个性寻找共性，在共性中把握个性特征。

六是以经注经、以经解经的方法。

笔者在参看现今诸多学者相关研究论著的时候发现，大家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典籍的研究大多采用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即先将其划分为几个中心题目如宇宙论（天道观）、性命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等，以此来统摄历史人物或历史典籍的全部，然后再围绕这几个中心出发，从历史人物思想与历史典籍中寻找相关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和论证。其实这种研究方式自上世纪西学东渐以来，已渐成学界一种潮流和不变的学术范式。笔者认为以此学术范式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与经典，有割裂历史人物思想与典籍之嫌，不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古代思想。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力争回归中国原有的以经注经、以经解经的研究范式，尽管不可避免会用现代学术话语，但还是力争让历史人物与经典自说自话，而自己毋宁做他们思想与行状的转达者。即便如此，笔者尚以为才疏学浅，恐不能及，唯有尽心勉力而已。

七是作者个人生平与作品思想内容交叉定位法。

笔者以为，由单方面的材料来探讨一个人思想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是这方面的材料未必可信，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思想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不能凭藉一个人年轻时的思想来推测他晚年时期的思想也必然如此，反之亦然。这就需要在研究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对此人的生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他的思想演进之路有一个比较完整细致的把握；同时，还必须从其著作本身出发，由其著作整体所反映的思想来予以更为具体的体认，并将之贯之于著作的细节之中。如果我们凭藉其著作能够确认其思想的概貌，则在著作完成之时，其思想特质亦应大致如此。至于此后其思想又是如何，我们不能马上予以评判，而须根据此后的著作和材料来予以探析。



C 目录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围绕《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几个问题	1
第一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	1
一、《论语集解》的著述背景与动机	2
二、《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	8
第二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作者、成书时间	15
一、《论语集解》的作者、成书时间	15
二、《论语集注》的作者、成书时间	38
第三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学术评价	44
一、何晏《论语集解》的学术评价	44
二、朱熹《论语集注》的学术研究及评价	50
第二章 《论语集解》、《论语集注》之文字、章义疏解探析	59
第一节 分章断句之比较	60

